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视域下的中非农业合作

张梦颖¹,陆航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710;2. 陕西师范大学 区域国别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始终将保障非洲民众粮食安全放在中非农业合作的关键位置。中非农业合作所取得的成绩标志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的不断深化和高质量发展。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中非不断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模式必将为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提升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和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关键词:携手推进现代化;四大全球倡议;中非农业合作;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15

粮食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直接关乎各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1]。从人类安全本质出发,粮食权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权利之一。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其中,非洲粮食安全困境最为显著^[2]。但非洲农业发展面临资金紧缺、基础设施匮乏、生产方式较落后等现实挑战,无法完全依靠自身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此,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时宣布,中方将实施包括兴农惠民伙伴行动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为助力非洲消除饥饿、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农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助力非洲消除饥荒、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农业合作途径愈加多样、影响力愈加凸显,已取得多项务实成果,并向全产业链延伸。随着四大全球倡议的陆续提出,中国不仅将粮食安全作为自身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更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模式,为维护非洲粮食安全付诸中国行动。中非农业合作将为助力非洲发展现代农业、增强非洲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提供更多支持。本文将客观分析非洲粮食安全现状、根源与挑战,聚焦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视域下中非农业合作如何助力非洲应对粮食危机,并展望未来中非在农业领域合作的前景。

一、非洲粮食安全现状与影响

“粮食安全”的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演化过程,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政

收稿日期:2024-11-07;修回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创新工程A类项目“中非关系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

策的思考变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96年在世界粮食首脑峰会上最终确定了粮食安全概念^①及其四维性质,即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可利用性和稳定性,这也揭示了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和公共物品的多重属性,即经济属性、政治和社会属性等。作为特殊商品,粮食具有经济属性,并呈现从单一商品属性向多维度发展的特点,即从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营养物质的单一属性的商品向商品、金融、能源等多维属性转化;作为公共物品,粮食还兼具政治和社会属性,粮食既是保障政治稳定的根基,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诱因^[3]。正如非洲学者马哈马特·卡比鲁·多多(Mahamat Kabirou Dodo)所指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其与国家政治与领导力、战略政策、武装冲突、贸易和经济利益、农业生产和粮食系统、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紧密相连^[4]。粮食安全早已突破“高政治—低政治”的简单二元划分和研究窠臼,而被视作可能危及个人与国家生存福祉的非军事威胁,成为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5]。

(一)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形势严峻

自21世纪以来,非洲大陆迎来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非洲粮食安全状况依然严峻。非洲是一个可耕种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生态系统多样的地区。但是非洲粮食自给率低、高度依赖粮食进口,许多非洲国家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和矿产等资源性大宗商品的出口贸易,农业、渔业和林业仅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与其他各大洲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居民家庭用于购买粮食的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最高,平均值约为23%,其中该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占比高达33%^[6]。粮食支出的高比例也造成该地区极易受到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这对其粮食安全和营养多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粮食价格、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负面影响。目前,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远远超出全球及其他区域平均水平。2023年,非洲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普遍率达到58%,这一数字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28.9%的两倍,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和大洋洲,这一比例更接近全球平均值——分别为28.2%、24.8%和26.8%。尽管农业粮食系统转型是维护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受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缩减了农业财政支出,这令非洲国家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粮食系统转型和粮食安全问题面临重大挑战。

在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的阴影下,非洲饥饿人口数量正在不断攀升。2024年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等国际机构联合发布2024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该报告指出,全球饥饿问题进一步加剧,全球饥饿发生率连续三年几乎保持在同一水平。全球饥饿人口比例中非洲饥饿人口比例上升趋势最为明显。2023年,全球有7.13亿到7.57亿人面临饥饿,非洲约有2.984亿人面临饥饿。换句话说,世界上每11个人中就有1人、非洲每5个人中就有1人深陷饥荒。相比于亚洲(8.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2%)、大洋洲(7.3%)等区域,非洲仍是全球营养不良发病率比例最高的地区,约占20.4%,远超世界平均值9.1%。其中,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中部非洲和北部非洲营养不良发病率分别为28.6%(1.385亿人)、16.0%(7040万人)、9.6%(2548万人)、30.8%(6220万人)和7.8%(2070万人)。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5.82亿人患有长期营养不良,其中超过一半人数在非洲,而全球53%的饥饿人口也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7]。2030年全球饥饿人口的

① 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世界粮食首脑峰会,对“粮食安全”进行如下阐释:“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所需的膳食及食物喜好,就存在粮食安全。”该定义不仅被后来学界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且该定义确定了粮食安全的现代意义和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即可供应性(availability)、可获得性(access)、可利用性(utilization)和稳定性(stability)。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风险与应对》,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2页。

比例将与2015年联合国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的水平相当。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严峻性表明,联合国设定的2030年“零饥饿”目标可能将难以实现,甚至全球粮食安全水平将倒退回20年前。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尽早消除饥饿,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国际援助的非洲国家将首当其冲,不仅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日益增加的生存威胁,更有可能沦为粮食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二)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多维影响

从粮食的经济属性来看,全球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快速上涨加剧了非洲国家对粮食危机重现的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非洲国家粮食和化肥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但乌克兰危机并未直接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而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放大了市场的紧张局势。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粮食价格波动是市场结构性问题、出口限制、粮食能源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对全球谷物、植物油等农产品交易也造成了严重干扰,大约12%的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将面临供应链风险。2022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43.7点,同比增长14.3%,是自199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23年全球食品价格较2022年均值下降13.7%,食品价格指数为118.5点,环比下降1.5%,同比下跌10.1%。世界粮食库存量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农业市场主粮储量面临严重短缺。在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全球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库存量已经处于历史最低值,相比而言,全球稻谷的库存量处于较安全的水平。全球能源、化肥和劳动力等农业生产成本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国际运输成本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抬高了进口农产品的价格。受此影响,身处粮食供应链下游的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并对非洲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微观上,从事粮食生产的非洲企业、农场、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而消费者的粮食购买成本也因此抬高;宏观上,非洲粮食不安全问题将进一步加重非洲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发展滞后,甚至陷入低增长陷阱。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非洲国家将面临农业财政支出的不稳定性。尽管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马拉博宣言》《阿布贾宣言》等非洲农业发展战略的签署国,但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的落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非洲国家被迫将财政支出用于紧急粮食援助或粮食补贴,而牺牲了农业长期发展,远未达到各国所承诺的农业支出预算10%的目标,并且非洲在实现《马拉博宣言》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展不足,使得非洲营养不良和饥饿形势雪上加霜,亟待国际社会的支持。

从粮食的政治和社会属性来看,粮食不安全使非洲民众吃饭问题难以保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激增。相关数据模型证明,粮食安全与国家治理水平呈正相关性,提高国家粮食治理水平对确保非洲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只有人人都能享有包括粮食权在内的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但是非洲国家一直缺乏经济和粮食主权,特别近年来,粮食逐渐从生存必需品成为国家战略资源,甚至逐步沦为个别西方国家政治博弈的工具,导致粮食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加重^[8]。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粮食金融化和能源化成为推动近年来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将粮食作为金融“衍生品”大搞粮食期权和“圈钱运动”,抬高全球粮食价格;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顾非洲饥饿人口缺粮现状仅从自身利益考量,将粮食能源化,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以替代传统能源,不仅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而且加剧了全球粮食消费需求结构的严重恶化^[9]。随着发达国家对燃料乙醇等生物质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大量玉米、木薯、高粱等燃料乙醇的主要生产原料被用作工业用粮,这导致贫困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受到严重抑制。因此,粮食能源化的趋势将会加剧发达国家与非洲饥饿人口抢夺粮食,造成局部或区域范围内粮食不安全情况和社会仇恨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是导致非洲国家居民家庭消费下降、贫困加剧、诱发社会规模性抗议和动荡的重要原因,而粮食危机极易加剧地区社会动荡。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非洲分部相关报告,受此轮粮食危机的影响,苏丹、津巴布韦、斯威士兰、马拉维、莱索托、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政治和经济脆弱性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影响;如果粮食供应持续下降、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该地区政治动乱和

民众抗议的风险也随之增高^[10]。

整体来看,国际局势等因素加剧了非洲粮食安全的结构性困难,凸显了非洲粮食系统的脆弱性,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缺乏粮食主权的非洲国家。粮食价格上涨对依赖粮食进口的非洲国家来说是致命打击。埃及是非洲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非洲粮食进口的19.3%、世界进口的3.7%;其次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等国家。非洲前十大粮食进口国约占非洲大陆粮食进口量的2/3以上,这也增加了乌克兰危机下这些国家粮食安全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非洲国家的主粮进口来源国,特别是埃及和苏丹,分别从俄罗斯进口33%的粮食;乌克兰则分别向突尼斯和埃及出口34%的粮食和22%的粮食。乌克兰危机对非洲不同国家的粮食安全冲击具有明显异质性。此轮粮食危机对北部非洲地区的影响最为严重,该地区主要以小麦为食,且大部分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埃及的小麦进口量占其小麦总消费量的62%,其中,埃及86%的进口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苏丹和其他几个北非国家,情况也类似。整体而言,埃及、毛里塔尼亚、苏丹、刚果(布)等长期依赖小麦、植物油和化肥进口的国家对粮食价格波动更为敏感,通货膨胀也随之上升,粮食购买力下降,而许多中部非洲、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国家受到此轮价格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

二、非洲粮食安全困境的根源与挑战

非洲大陆粮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消除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现状所面临的新挑战正在不断加剧。人口快速增长、气候灾害频发、低烈度武装冲突持续、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粮食短缺,正在诱发非洲大陆新一轮粮食危机。

(一) 非洲粮食安全困境的产生与溯源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存在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非洲大陆是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多项考古史实表明,早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800年,非洲多个地区就开展了对珍珠粟、高粱、稻米等粮食作物的驯化和农业实践,为农业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新石器时代,随着洲际间动植物的传播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非洲大陆出现了多样化的粮食生产系统组合,从而形成了高度人为化的农业景观^[11]。非洲早期文明也以农业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古埃及文明的兴起正是得益于尼罗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使得古埃及人能够种植小麦、大麦、豆类等多种农作物,富足的粮食储备最终促进了古埃及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12]。古埃及的灌溉农田和畜力耕地都为当时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13]。遗憾的是,非洲古代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技术的辉煌成就未能延续。到17、18世纪,受奴隶制、跨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人民的“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①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彻底剥夺,非洲国家的主粮种植被迫中断,转而生产西方国家迫切需求的热带经济作物。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换取外汇,再从国际粮食市场进口粮食,非洲人从粮食的生产者逐步沦为粮食的购买者^[14],甚至许多非洲国家的传统粮食生产、消费和饮食方式也因西方殖民者的强行干涉而被迫改变,非洲人从食用营养丰富的谷物到营养特性较差的木薯的饮食转变,就是受殖民主强迫种植所导致的。

非洲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是导致粮食结构性短缺的重要根源。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取得民族和国家独立,但是“重工业、轻农业”的政策导向一度使得非洲国家对农业部门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非洲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对初级商品的依赖以及对农业部门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机制,最终造成了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技术能力有限,这不仅影响了非洲粮食生产,也成为非洲消除饥荒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重要障碍。非洲国家农业部门不仅雇佣了非洲60%以上的劳动力,而且非洲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整个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5%~34%。2017至2019年,

① 粮食主权是指当地民众拥有管理和保障本地粮食系统的权利。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均值为 1.41 亿吨;2010 至 2019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均增长率为 2.42%。预计 2020 至 2029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均增长率为 1.66%,2029 年谷物产量约为 1.694 亿吨^[15]。尽管近年来非洲粮食生产力略有改善,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自身农业产量和自给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则,非洲国家农业结构多以小规模农作 (small-scale farming) 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无力购买化肥、农业机械来改善土壤肥力,所以生产要素投入小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升。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欠发达国家在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的国际援助^[16],其中,非洲国家是多边国际机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主要援助对象^[17]。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削减对非洲的援助金额(参见表 1),这使得国际减贫机制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遇到了严重阻碍。援助资金也使得许多非洲国家深陷对外依赖症。一些西方国家为扩大对非洲影响力和争取力度,还趁机向非洲国家施行多项附加条件的粮食援助,进一步剥夺非洲粮食主权,抑制了非洲国家应对外部风险、对粮食安全冲击的能力。

表 1 2016—2022 年部分 OECD 成员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净支付
(单位:百万美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美国	9 839.7	11 190.2	10 693.8	9 572.1	11 417.9	13 884.6	12 882.6
德国	3 498.7	3 690.6	4 322.2	4 549.2	5 843.8	5 939.1	5 023.3
英国	3 857.1	3 855.1	3 816.5	3 809.4	3 347.1	2 383.8	1 508.9
法国	2 216.7	2 361.5	2 773.0	2 950.1	4 267.4	3 554.1	4 259.7
加拿大	973.5	1 139.6	1 328.1	1 080.5	1 341.3	2 140.3	1 893.2
日本	1 494.7	1 674.4	1 385.8	1 572.5	1 248.7	1 981.1	1 937.7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OECD 报告整理而成,具体参见 OEC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2024, Paris: OECD Publishing, March 7, 2024,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geographical-distribution-of-financial-flows-to-developing-countries-2024_fbd9569c-en-fr?mlang=en.

(二)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的内部挑战

非洲粮食生产受制于土地利用、土壤贫瘠等因素。实际上,非洲的农业生产潜力巨大,拥有世界上 60% 的未开垦的耕地面积。但很多非洲国家可耕种土地面积的开垦十分有限,土地利用严重不足,其农业生产增长率还不及人口增长。在许多非洲国家,农村地区的高人口密度导致农业部门正面临来自土地短缺和土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另外,土壤肥力是限制非洲粮食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非洲 40% 的土壤正面临严重退化,荒漠化更严重破坏了非洲土壤的状况。由于对旱地粮食生产的强烈依赖和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非洲可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整体来看,非洲大陆土壤肥力分布不均,在萨赫勒干燥的稀树大草原地区,土壤就极度缺乏营养物质,而在东非大裂谷的高地附近,由河流冲积层和火山活动所产生的肥沃土壤就为大面积粮食种植提供了支持。尽管许多非洲国家实施了化肥补贴政策,但非洲地区化肥的使用量是各大洲中最低的。而且,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化肥的净进口国,短期内因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也会抑制该地区的化肥购买和使用。水资源严重短缺是非洲农业发展面临的又一挑战。非洲农业种植主要依赖于自然降雨,这也导致降雨量少或干旱直接影响非洲粮食的产量。近年来,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加剧了非洲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特

别是在北非人口密集的干旱地区和非洲之角国家,水资源所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粮食不安全现象正在日益加剧。例如,东非和非洲之角地区常年受洪水、干旱^①和蝗灾的影响,当地民众一直深陷粮食危机和饥荒。2023年,非洲之角地区至少有36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经历了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以上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非洲大陆仅仅依靠自身很难实现粮食的可供应性。

非洲粮食需求增长率远远超过本土粮食供应增长率。人口增长是造成非洲粮食需求增加和粮食对外依赖性加重的关键因素。非洲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率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非洲国家主粮自给率正在不断下降,难以满足基本需求。目前,非洲本土粮食生产不足以养活该大陆14.3亿人口;到205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达到24.9亿。非洲本土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当地粮食需求的10%,且当地生产的粮食营养含量较低,无法满足民众每日膳食的基本营养需求,这些客观原因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国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预计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麦、大米、玉米等主粮进口量将增加75%,而北非地区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深^[18]。根据联合国报告显示,2022至2050年,世界新增人口的半数以上将集中在尼日利亚、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埃及等9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和坦桑尼亚的人口年增长率将达到2%甚至3%以上^[19]。尽管迄今为止人类尚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增长超越粮食生产的增长,但学界关于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之间平衡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截至2023年6月,全球低收入缺粮国家(LIFDC)名单由44个国家组成,其中,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等34个^②非洲国家位列其中^[20]。对于非洲低收入缺粮国家来说,人口增长和贫困的双重制约极易造成民众在粮食供应不足时又缺乏购买力,同时降低粮食的可供应性与可获得性,因而更容易受到粮食危机的直接冲击。

社会不平等、流行病、暴力冲突等粮食供需环节也会对粮食安全提出严峻挑战。2024年4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24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指出,暴力冲突、经济冲击、极端天气是造成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21]。2021年初,马拉维因严重饥荒而陷入社会不稳定,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大规模失业,造成当地民众难以负担或获得基本粮食保障,对政府和经济状况不满情绪高涨。另外,武装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数量激增,也是造成非洲粮食危机难以彻底解决的又一原因。苏丹一直深陷饥荒和粮食短缺,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以来,苏丹粮食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约有2030万人亟待国际社会紧急粮食援助。2023年6月至8月,布基纳法索北部萨赫勒大区频繁遭到武装组织袭击,共造成4.3万人被围困并面临严重食物短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

三、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途径

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国际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以来,中非农业合作已走过60多年的峥嵘岁月。从最初的官方无偿粮食援助到农业援助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农业援助措施呈现系统化、多样性演化^[22],中非农业合作方式可谓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中国坚定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粮食安全理念,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23]。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农业合作迈入了新时代,迎来了更加紧密的新型中非农业合作关系。中非农业合作已形成较完善的合作机制,合作途径亦更加丰富,作用更加深远。

① 历史上,非洲之角低地地区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周期性的大旱灾。具体参见[英]迈克尔·克劳德编:《剑桥非洲史·20世纪卷(1040—1975)》,赵俊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0页。

② 还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

(一) 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心协调作用,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粮农三机构的相关工作。中国通过国际涉粮组织与非洲国家共同推进南南合作,助推非洲大陆早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零饥饿”“零贫困”目标。自1996年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机制以来,中国已在非洲数十个国家实施了20余个南南合作国别项目,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多年来,中国与国际涉粮组织和非洲国家开展三边和多边农业合作取得了卓越成效,也获得了国际赞誉。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派遣长短期援非专家和技术人员200多人次,向非洲国家转移了400多项农业技术,有效提升了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马里、马达加斯加等受援国的粮食安全水平。2017年,依托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乌干达南南合作项目而建成的“中乌农业合作产业园”被中国农业农村部评为“首批境外合作示范园区”,成为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样板项目,获得“首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24]。自2020年底起,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字千村”的倡议下,中国通过分享其数字乡村的经验做法为促进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粮食生产、促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树立了典范。非洲国家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平台积极学习中国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种植技术和农村减贫经验,增强了自身农业生产力。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切实提升和保障非洲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不仅提出了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还为促进形成更加安全、稳定、合理的国际粮食安全新局面,推动增强非洲国家在涉粮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发言权以及合理诉求而不断发声。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与中国农业系统相似,非洲国家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也面临诸如传统耕作与农业机械化、小农种植与规模种植、种植主粮抑或经济作物等生产矛盾,亟待国际社会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非洲国家也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不得不面对缺乏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现实困境。一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始终为帮助非洲国家平等实现粮食权而积极呐喊,多次提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相关议题和倡议,多次谴责美国和欧盟无故实施经济制裁和紧缩措施以阻碍发展中国家粮食权实现的行为,多次挫败了美西方国家企图利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干扰国际粮食贸易畅通的恶劣行径,有效维护了非洲国家饥饿人口的粮食权。例如,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国际农业补贴环境,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于2017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了有关呼吁发达国家削减扭曲农业贸易超额补贴的联合提案。2023年7月中国农业专家屈冬玉博士再次连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的当选为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和话语权、加快解决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问题、改善全球粮农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时提出了中非务实合作三项举措,其中,中国将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通过深化中非农业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磋商、提升非洲农业产业链和产品附加值、加大农业技术合作、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提高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推动非洲农业转型升级的实现,体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助力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坚定决心^[25]。

(二) 大力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的推动下,中非农业合作务实性成果丰硕。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都将农业合作作为中非合作的优先事项。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采取了多项农业援

助和合作措施,为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理念与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之间深度对接贡献了重要力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助力与合作机制。从政策和机制设置来看,中非之间已形成农业合作的机制平台。2019年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机制化的形成,中非双方成立了中国—非洲联盟农业合作委员会,共同编制《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了中非农业合作机制层次。2023年11月,第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论坛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部落实《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合作举措(2024—2026)和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倡议,为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助力。中国还于2022年1月发起成立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现在已有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82个国家加入,共同为粮食安全等发展议题凝聚国际共识;同年6月,中国提出推进“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与非洲国家共享粮食生产技术与发展经验;同年11月,外交部非洲司和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共同举办了“中非丰收之夜”“非洲粮食安全和中非农业合作”主题沙龙、“中非农业合作这十年”图片展等系列活动共同回顾中非农业合作成果。针对粮食减损、粮食供应链、杂交水稻援外等议题,中国还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布《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召开期间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并举办了“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中非围绕“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发展,通往现代化之路”主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并发布《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为未来三年中非农业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除国家层面外,地方政府也积极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交流平台。湖南省已成功举办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该博览会为非洲优质食品和农产品输华提供了便利。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强调中方将与各国协调行动,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畅通,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2025年9月,中国又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中方将支持联合国落实包括“消除饥饿,消除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等56项行动在内的《未来契约》。整体来看,中国已与20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签署了农业合作文件共计31项;23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72项多边和双边农业合作文件。中非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之间各层级的农业合作机制^[26]。

第二,紧急粮食援助与农业贸易。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危机,中国通过捐赠等传统手段,向非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紧急粮食援助以缓解粮食紧缺国家的状况。在多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中国政府均承诺向非洲贫困和受灾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特别是2019年以来,索马里、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角国家饱受干旱、蝗灾和饥荒的威胁,中国政府已多批次向这些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粮援。自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已向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援助,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2022年以来,中国就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3万多吨紧急人道主义粮援。中非农业贸易成为近年来中非农业合作的最大亮点,中非农业贸易已连续多年稳步增长,中非农产品贸易额比10年前翻了近一番。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国,近年来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速达11.4%。2023年,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总额达53.2亿美元;2024年,中非农产品进出口首次突破700亿元。并且,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越来越畅通,非洲柑橘、芝麻、可可已占到中国同类产品进口量的一半以上,超过350余种非洲农产品、食品可开展对华贸易。来自肯尼亚的鲜食牛油果、卢旺达的辣椒、贝宁的菠萝等新一批非洲特色农产品不仅获得了中国市场准入并出口中国,而且也助力非洲农户脱贫致富贡献了力量。

第三,农业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中国在非农业投资与援助主要分为具体的农业项目投资与援助、农业产业发展援助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等。首先,具体的农业项目投资与援助帮助非洲提高农业生产率。

目前,中国在非洲 35 个国家有 200 多家农业投资企业,涵盖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各产业,其投资存量超过 10 亿美元,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产品附加值和产量。除了中资企业以外,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积极参与当地农业项目援助。中国农业大学于 2011 年起在坦桑尼亚地区先后开展了“小技术、大丰收”玉米增产项目和“小豆子、大营养”大豆价值链改良项目,分别采用中国的玉米密植技术和玉米套种大豆技术,提升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熊友才教授团队根据肯尼亚气候和土壤特征研发的垄沟地膜覆盖栽培新技术,提高了当地旱地节水农业技术水平,当地玉米和小麦产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其次,针对农业产业发展援助。中非农业合作正在向全产业链延伸,其中,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现代农业,形成育种、种植、加工、仓储和物流完整体系,打造畜牧养殖和经济作物特色产业,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农产品、食品安全水平和附加值。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于 2018 年推动实施了“中国—埃塞俄比亚农业合作项目”,该项目将致力于提升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肉牛和芝麻产业合作空间,针对产业价值链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合作方式,以提升埃塞俄比亚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7]。最后,除了无偿援建以外,中国还通过工程承包、直接投资、优惠贷款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水电站、水利灌溉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并且,中国企业还积极打造“小而美”项目以弥补偏远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现状,改善当地农业和粮食生产环境。例如,中国中铁资源集团、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刚果(金)、赞比亚等国家投资了很多小型项目,为非洲乡村农业发展提供了电力、通信和水资源。另外,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也积极响应“百企千村”活动,主动与驻在国共同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为提升非洲粮食安全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根据《行动计划》精神,在非中国企业将在妇幼健康、教育培训、乡村发展、清洁饮水等领域实施 500 个公益项目,为当地创造不少于 100 万个就业岗位。

第四,农业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中国始终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农业合作原则,以农业技术分享与转让为路径,助力非洲国家增强自身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自给率。包括玉米密植、蔬菜栽培、木薯快速繁育等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在非洲实现了推广,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 30% 到 60%,让非洲 100 多万小农户受益。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和减贫经验。中国在非洲国家推广菌草种植和食用菌技术、棉花品种“中国 1 号”“中国 2 号”、杂交水稻、绿色超级稻和海水稻种植,有效提高了当地单产,为帮助当地农户减贫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已在 20 多个非洲国家推广杂交水稻种植,大大提高了非洲地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例如,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面积超 7.5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 7.5 吨,超出当地品种产量的三倍以上,实现了以粮农作物品种改良实现粮食援助和解决当地粮食安全问题的目标。中国还在南非、卢旺达、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莱索托等非洲国家推广菌草项目,建立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为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近年来,中国还在植物工厂建设、作物光能高效利用、种子安全等领域突破了自然与环境桎梏,颠覆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解决人口与资源间矛盾、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革命性途径^[28],这也为有效缓解非洲粮食危机提供了更多路径。其次,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农业技术转移和农业专业人才培养。中国现代化农业技术可帮助非洲当地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截至目前,中国已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 24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 367 人次农业技术专家,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作物生产及加工方面的技术示范等,为非洲国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减贫合作提供了支持。中国科学院在肯尼亚设立了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首个科研机构,为中非双方加强农业科研技术交流、探索适合非洲国家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支持。最后,开展农业技术研修班和学历学位教育。自 2012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系统已为非洲 52 个国家举办了 400 余期农业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近万人次,还多次举办专

题研修班,例如“可持续农业发展与智慧农业”研修班、“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生产与粮食安全研修班、非洲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研修班等。2015年,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落户北京大学,该院将向非洲学员介绍和分享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等相关经验,并颁发学历学位。2022年4月,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和云学校成立,为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稻米、木薯和菌草价值链线上技术培训。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于非洲来说,经济上可负担得起,形式上更容易适应非洲农村地区的环境,这也是非洲国家愿意与中国开展中非农业合作的重要原因^[29]。

四、中非农业合作的未来前景

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农业资源,其青年人口可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人力储备。但是,由于非洲大陆农产品出口附加值极低,非洲农产品贸易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非农业合作不仅可以为非洲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赋能,也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30]构建的重要举措。中非农业合作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在粮食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方面的附加值,推进非洲国家粮食产业链的形成。未来,中非农业合作应借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和“一带一路”平台改变非洲国家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的劣势地位,在数字技术、绿色农业、青年人才培养等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尽早实现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

(一) 新增长点:数字农业与技术创新

数字农业和信息技术将成为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增长点。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生产力,减少粮食损失,推动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还可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但是根据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非盟共同发布的《可持续农业机械化:非洲框架文件》显示,非洲的农业机械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各个非洲次区域的农业种植主要依靠人力生产。作为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一直在助力非洲农业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方面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中国农业机械出口为非洲农业机械化和粮食单产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中国价格便宜且操作简单的小型农业机械深受非洲农民的青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农业和信息技术成为快速提升非洲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重要手段。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部门正在经历深远的技术变革,其中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无人机等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类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效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考察了4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字农业发展情况后指出,尽管各个国家农业部门数字化进程各有不同,但实现非洲大陆包容、合作的农业数字化进程对提升非洲农民福祉、消除贫困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1]。埃塞俄比亚、南非、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本国的数字农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但其资金和技术水平仍亟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也给非洲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根据2022年5月发布的《非洲国际电子商务白皮书》显示,2019年非洲电子商务用户数量已达2.33亿;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78亿,非洲电子商务发展潜力不容小觑。但是面对不平等的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非洲农民和贫困人口急需接受数字技术培训以弥补和缩小当前非洲农业领域的数字鸿沟,以确保非洲农民和贫困人口能够分享到数字创新所带来的便利和经济红利^[32]。目前,中国已经在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硬件制造、光缆铺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方面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还正在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数字基础设施面貌、建设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以提升非洲在农林水利、防灾减灾方面的能力。并且,中非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网购等新型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人也加入这一行业,接受了中国的数字技术培训。例如,湖南的中非经贸促进创新示范园设立

了中国第一个中非直播带货基地,其中不乏在华非洲留学生担任直播主播,为非洲农产品带货。中国还连续举办多届非洲好物网购节,通过中国各大电商平台推广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目前,根据第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精神,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已成立,该联盟将为促进非洲国家农业技术提升和中非农业联合研究助力。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还承诺将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中非电商领域合作。今后,中非农业合作应继续抓住数字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加强数字技术转让以提升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并吸引更多非洲农户加入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当中,助力非洲农产品销售与农村地区减贫脱贫。

(二) 靓丽名片:生态多样性与绿色农业

助力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升级是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靓丽名片。农业系统生态多样性对于确保非洲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质能源兴起、新圈地运动、气候变化对雨养农业冲击等破坏非洲大陆环境、忽视农业粮食系统和生态多样性的行为都将给地区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为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和人口增长,气候智慧型农业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其适用范围也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拓展,为非洲国家增强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尽管非盟和其他次区域组织都出台了“气候适应+”等措施以增强非洲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但目前非洲国家普遍缺乏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政策性投入,特别是非洲农村地区的小农和妇女等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边缘群体普遍缺乏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面对非洲国家的现实挑战,中国始终在机制和技术两个层面上助力非洲国家发展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农业种植。从机制层面来看,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非之间已签署“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并实行“中非绿色使者计划”和“中非绿色创新计划”等项目,还与53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共同发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从技术层面来看,除了共同研发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外,中国还为非洲国家提供气象监测、对外卫星等援助以减缓气候变化对非洲农业发展所造成的次生灾害^[33]。中国还通过地球大数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2020年中国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并研发“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为11个泛非绿色长城机构成员国提供国家土地生产力动态监测指标,可助力非洲预判该地区土地生产力水平和荒漠化情况等^[34]。

作为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在对非农业合作中始终支持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转型。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中国新粮食安全观和大食物观的树立^①,可为维护非洲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贡献中国力量。例如,中国已在尼日利亚等国推广绿色超级稻种植,帮助当地实现了节水抗旱、少施化肥、优质高产等育种目标。另外,中非沼气技术合作为解决当地环境问题、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已在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实施沼气工程建设,在莱索托推广沼气池,在贝宁、科特迪瓦等国开展沼气技术合作和培训班。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2021年,位于四川成都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首批四个“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之一,该所为非洲国家推广低碳循环农业和农村能源相关技术提供了交流、培训和合作机会。今后,中非农业合作应继续以提升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和农业灾害应对能力为出发点,打造兼具商业利益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产业,助力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升级。

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三) 坚实保障和底色:农业青年人才培养

加大对非洲农业粮食系统中青年人才培养是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坚实保障和底色。青年是建立非洲可持续农业粮食系统和实现非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世界上青年人口占比最高的大陆,非洲大约有4.2亿年龄在15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但是非洲青年人面临较高的失业率,而农业部门恰好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想选择。据估计,到2031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52%的人口仍将居住在农村地区,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一半以上农村人口的地区;到2035年,非洲国家大约需要设立1000多万个新就业岗位,才能够满足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青年人口,而农业部门的韧性可为参与农业价值链的年轻人创造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而且,青年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可为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赋能。

中国始终是促进非洲青年参与农业粮食系统转型升级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历来重视非洲青年的发展,特别是农业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时所指出的,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在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不仅宣布设立“鲁班工坊”、中非创新合作中心等一系列专门项目以提升非洲青年技术能力,还提出了非洲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的培养计划,为非洲农村青年发展提供了生存和就业的机会。根据2024年发布的《行动计划》重点举措,中方将在农业、渔业等方面支持非洲国家人才培养,继续推动实施非洲青年农学研究者卓越培训计划,支持非洲乡村发展领导者培训,届时将有更多非洲青年人从中受益。另外,中非未来领袖对话、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青年联合会、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等中非青年合作交流的平台与机制也越来越成熟,有效提升了非洲青年发展能力,加强了中非青年之间的深厚友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农创客大赛,也为包括非洲青年创业者和农业粮食系统参与者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机会,激发并推动了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农业系统转型。作为中非人文交流重要平台,中国非洲研究院也积极参与中非减贫经验交流和青年培养。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品牌项目“大使讲坛”“非洲讲坛”“中国讲坛”多次聚焦非洲农业、中非减贫经验交流等主题,为培养非洲青年参与农业粮食系统转型、扩大中非青年多领域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今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应携手联合国、非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共同促进非洲农村青年发展,提升非洲青年农业技术水平,鼓励和支持非洲青年企业家投身农业领域。

五、结 语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全球粮食供应链的严峻挑战,非洲各国以及非盟等区域组织都在积极寻求摆脱粮食对外依赖性的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仅仅依靠非洲自身还不足以改变粮食不安全现状。多年来,中非农业合作为提升非洲粮食生产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对非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随着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粮食自给率提供机遇,为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力量。今后,中非双方应加强推进数字农业和创新能力,发展绿色农业与智慧农业,加大对非洲农业粮食系统中青年人才培养,为助力非洲应对粮食安全挑战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汇聚国际力量。

参考文献

- [1] FAO. The Right to Food[EB/OL][2023-02-06]. <https://www.fao.org/right-to-food/en/>.
- [2] 张梦颖. 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J]. 西亚非洲, 2022(4): 51-52.
- [3] 李文明. 读懂中国粮食[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1.

- [4] BARAKAT MAHMOU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EB/OL][2021-01-20]. <https://www.intechopen.com/books/8063>.
- [5] SIDDHARTH MALLAVARAP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Non-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M]. New Delhi: WISCOMP, 2008.
- [6]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2[R]. Rome: FAO, 2022.
- [7]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4[R]. Rome: FAO, 2024.
- [8] 张帅. 乌克兰危机下的全球粮食安全[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4):156.
- [9] 胡冰川.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7):86-95.
- [10] PIETER SCRIBANTE. Food, Inflation,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Africa[EB/OL][2022-08-15]. <https://www.oxfordeconomix.com/resource/food-inflation-and-regime-stability-in-africa/>.
- [11] AUGUSTIN F. C. HOLL. Archaeology of African Agro-systems: A Macr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22(1): 6-19.
- [12] 任继周. 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
- [13] 安春英. 中非农业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互动[EB/OL][2023-02-08]. https://ex.csn.cn/zx/bwyc/202204/t20220428_5406348.shtml.
- [14] 张永宏. 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5] OECD, FAO.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0-2029[R]. Rome: FAO, 2020.
- [16] 安春英. 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7] 安春英. 中非减贫合作与经验分享[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 [18] OECD, FAO.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1-2030[R]. Rome: FAO, 2021.
- [19] UNITED NATIONS. 9.7 Billion on Earth by 2050, but Growth Rate Slowing, Says New UN Population Report[EB/OL][2024-11-04]. <https://www.un.org/en/academic-impact/97-billion-earth-2050-growth-rate-slowing-says-new-un-population-report#:~:text=India%2C%20along%20with%20eight%20other%20countries%2C%20will%20make,Indonesia%2C%20Egypt%20and%20the%20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
- [20] FAO. Low-Income Food-Deficit Countries (LIFDCs)-List updated June 2023[EB/OL][2023-06-11]. <https://www.fao.org/countryprofiles/lifdc/en/>.
- [21] FSIN.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2024[R]. Rome: FSIN, 2024.
- [22] 唐晓阳.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5):58-61.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粮食安全[EB/OL][2023-02-11]. <https://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66192/1666192.htm>.
- [24] 吕珂昕. 中国——FAO——乌干达南南合作三期项目获东道国政府近千万美元支持[N]. 农民日报, 2022-07-05(6).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EB/OL][2023-08-25].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3nzt/xjpcxjgjlrdswchwbdfjxgsw/cgwj/202308/t20230825_11132530.shtml.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R].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 [27]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中国-埃塞俄比亚农业价值链合作研究——以肉牛、芝麻产业为例[R].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
- [28] 匡廷云, 卢从明. 加强光能高效利用机理研究的战略意义[J]. 科学与社会, 2011(1):23-27.
- [29] ISSAC LAWOTHER. Why African Countries Are Interested in Building Agricultural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Lessons from Rwanda and Uganda[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7:2318-2319.
- [30] 马涛, 陈曦.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4):136-153.
- [31] FAO. The Stat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s 2020[EB/OL][2023-02-22]. <https://www.fao.org/news/story/en/i>

tem/1309369/icode/.

[32] 赵斌,张雅婷.“后巴黎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合作[J].中国非洲学刊,2021(3):89-93.

[33] 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2)[R].北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2022.

[责任编辑 卫玲]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ining Hands to Advance Modernization

ZHANG Meng-ying¹, LU Hang²

(1.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School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kraine crisis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highlighted the situation of African food insecurity. I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to enhance the contin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to improve its food security. Under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China has placed food security as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China-African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mark the deepen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ining hands to advance modernizatio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form joint efforts to meet global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s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path. China's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model will definitel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ent's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mprove the food self-protection level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building an all-weath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new era.

Key words: joining hands to advance modernization;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an all-weath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new era